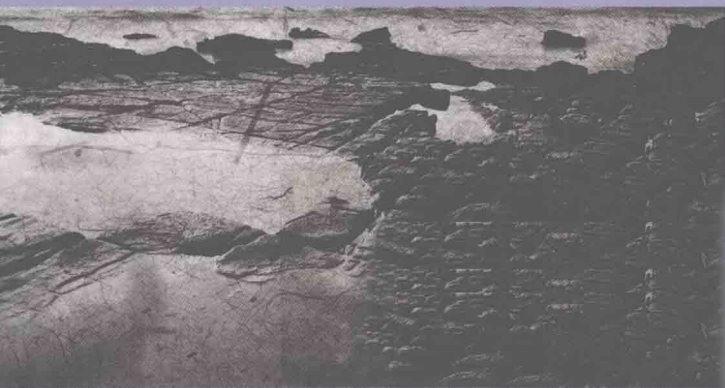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红岩》 是怎样炼成的

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钱振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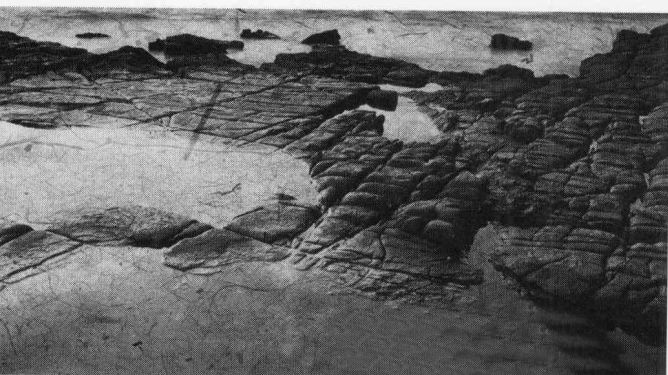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红岩》 是怎样炼成的

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钱振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钱振文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817-0

I. ①红… II. ①钱… III. ①红岩—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856 号

书 名:《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著作责任者:钱振文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817-0/I · 233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 16 开本 18.5 印张 26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史和研究,已经足足60年。在中国历史上,这60年是社会最为动荡又充满历史机遇的一个年代。但放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视野里,人们并不会为它离奇、剧烈、丰富的故事而惊诧。“当代文学”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记忆的这一历史时段中。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我们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懂得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为何迄今为止都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反而屡屡地被人误解和贬低。更容易看清楚的是,如果当代史观到今天还没有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

当代文学史学科自律性一直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下限始终无法确定。2000年后至今,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有如每年夏季长江无法控制的洪峰一样奔腾不息,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也不肯歇笔,对自己的思想头绪稍作整理,并对历史作更深远的瞭望。对新作的关注,仍然是最热门的事业。这就使当代文学很多从业者不得不放弃寂寞的研究,转入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当代文学批评在慷慨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鲜视角和信息的同时,也在那里蹂躏涂抹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著名作家的新作,还会冲刷、改写和颠覆当代文学以往历史的价值,“超越”依然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动人的词汇,正是它造成了当代文学观念的不断的撕裂。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的标准和研究规范经常被挪动,也就不难理解。

本丛书提倡从切实材料出发,以具体问题为对象,对当代文学史的“史观”展开讨论,据此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影响文学思潮、流派、文学批评和作家创作的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逐渐知道,它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环境中失败的症结之所在。

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认为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17 年文学”、“80 年代文学”等等也许是有必要的,它会有利于研究问题的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可能比宏篇大论更有益于问题的细致洞察,强化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反省,所谓的历史化也只能这样进行。

本丛书不收文学批评论集,而专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丛书作者以国内一线学者为主,但不排斥年轻新秀优秀著作的加入,更欢迎海外学者的加盟。既为文学史研究丛书,自然希望研究者以经过沉淀的、深思熟虑的文学现象为对象,不做简单和草率的判断;它强调充分尊重已有的成果,希望丛书的风格具有包容性,也主张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研究拥有包容性。

本丛书是对 60 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次努力的又一次开始,这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它并不奢望自己的出版能改变什么,但也相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前途并不糟糕。

程光炜

2011 年 3 月 2 日于北京

序 言

程光炜

钱振文 2003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但他是 90 年代初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学生当中属于“资深”的博士生。在此之前,他有在报业供职十多年的经历,这就使他的人生历练远比其他入丰富、复杂,有老到的阅世眼光和观察能力。当然,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漫长和丰富的经历也许不是坏事。

振文平日话语不多,即使与我说话最多的一个时期,例如讨论博士论文问题的时候,也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从不多言。听他硕士阶段的老同学说,振文读书是那种“沉潜型”的,他对于外在的诱惑好像没有反应,喜欢沉溺在书籍中,善于思索,而且比较安静。这种性格,按说是应该早早到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硕士一毕业反而去了新闻界,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老实说,也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他 2003 年考进来的时候并没有优越性,知识结构并不新颖,总是习惯按照 80 年代研究现代文学的方式想问题。他曾与我讨论过研究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似乎要投入对资料的阅读、发掘、整理,继而发现一条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路径。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我仍然非常担心。铁路的建设与现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了什么呢?尤其是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文化关系是通过什么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会被研究界接受并被认为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吗?如此等等,恐怕都非常麻烦。我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周旋了几个月。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建议他不妨专门全面地研究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一是国内的“红色经典研究热”刚刚兴起,这里面似乎还有不少

讨论的空间和可能性；二是即使已有“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成果，但还未发现采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和规模研究《红岩》的。振文马上、且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马上行动起来，先是与我的朋友、重庆师范大学的周晓风教授联系，自费去重庆实地了解、考证相关的资料，访谈了不少小说写作时候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接着，又到小说《红岩》责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故老编辑张羽先生家附近的小旅馆中“潜伏”了半个多月，运用记者善磨的能力，说服了张先生的夫人，每天去她家里，在张先生遗留的手稿、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这使他收获颇丰。另外，他还通过许多人，不惜代价和精力地穷究与《红岩》写作有关系的人和事，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踪迹和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不仅使他成为目前国内学人中掌握《红岩》材料最多的人，由于他的勤奋工作，和诚实、仔细、认真的考证，一些已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出现的错误，也都被他发现。读过近年来钱振文发表在一些学术杂志上的论文，我上面的“断言”应该不虚。据说，他的研究成果还受到了美国一些学者的注意。我相信，随着这部资料丰富、论证翔实的著作的问世，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对之产生浓厚的兴趣罢。

《红岩》的全面研究，面临着可以想象的挑战和难度。这是因为，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随着人们对“左翼文学”内部复杂性了解的深入，随着一大批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披露和出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模式，正在走向成熟化，形成很多方法、角度和特点。当然，这些“成熟”的方法和视角，也会使问题的进一步展开面临着阻碍。钱振文这部著作基本采用的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的重点是讨论国家新的出版制度形成之后《红岩》的“生产”和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反过来作者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也许并不是先有“出版制度”才有“《红岩》的‘生产’”，正是通过《红岩》“生产”的矛盾性、丰富性，也才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十七年文学”的“生产”罢。依我看，振文不是思辨性的研究者，他是那种通过大量辛苦而认真的爬梳，在对资料的分析、整理、质疑与讨论的基础上提出

自己观点的研究者。正如作者所说的：“本文采用的是‘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针对在写作方式上既有很大特殊性同时又有很大典型性的小说《红岩》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详细梳理《红岩》组织生产的整个过程和对生产过程当中详尽而具体的细节的甄别，呈现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复杂性。”“在这样的目标下，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搜集和使用了一相当一批非正式出版物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对当事者访谈时的口述实录；一些组织机构如出版社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也包括相当多的与此题目有关联的当事者如当年的责任编辑张羽、作者之一刘德彬、参与写作活动者沙汀、马识途等人的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字记载，这些文字记载包括工作日记、没有发表的手稿、来往书信、会议记录、采访记录等等。作为参考，这些非正式出版物资料将有选择地在本论文的附录中予以展示。”论文中使用了很多“没有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字记载”和“出版社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它们以“历史沉默者”的姿态，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红岩》小说从领导“出题目”、“组织写作”到“反复修改”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把这些看似分散、凌乱和无组织的材料再次“组织”为一种历史叙述，所揭示出来的就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复杂性”，还有后来历史对它们的有意遮蔽，以及今天人们在“看似重返”的过程中新设置的认识障碍。如此等等，都进入了钱振文深思熟虑的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最为出彩的部分。

但是，我们真能通过学术研究“复原”一部“真正的历史”吗？钱振文在书稿中也提出了一个不失尖锐的问题：“谁有资格代表历史发言？”他认为，“直到今天，对《红岩》的评论和研究的对象就是《红岩》本身，几乎没有谁对《红岩》创作前作者们的文字活动略加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写作之前，作者们带有文学性的文字活动少之又少，但是，小说《红岩》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文学史问题在这个时期都开始萌发，诸如‘写什么？’、‘谁来写？’、‘怎么写？’等等问题

4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

都可以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得到初步的答案。而在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中,最有意义的是谁有资格来描述历史?”当然,这不仅涉及当年的各种“讲述者”、“小说作者”等,也涉及今天“如何研究”它们的问题。而我以为的“难度”就在这里。当我们意识到应该用一种方法重新进入对它的历史整理和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方法”也在受制于一定的历史环境、知识氛围和学科约定。尤其是当《红岩》评价的“当代史”仍然在影响、制约着我们的清理性工作的时候,那么“谁有资格来描述历史”的问题就可能被暂时搁置。这也许正是这部博士论文潜在的学术价值所在。它以“呈现材料”的方式,提出了在研究《红岩》时随时可能遭遇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它不是以“做结论”,而是以“客观叙述”的方法,为今后进一步的“历史整理”腾挪出了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不是重新以一种“模式”将它捆死。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它的问题能给人带来研究问题和发现历史的惊喜。

2010年1月29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程光炜(1)
导 论	(1)
一 被冷落的《红岩》和《红岩》研究	(1)
二 李杨的“再解读”	(3)
三 朴贞姬的“生产方式”研究	(7)
四 作为概念的“当代文学生产”	(9)
五 《红岩》生产过程中的“断裂”和“接合”	(14)
第一章 对重庆大屠杀的最初书写	(17)
一 对重庆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18)
二 组织机构对大屠杀的两种表述	(23)
三 “编写”:对大屠杀叙述的规范化	(33)
四 《圣洁的血花》:对集中营生活进行“斗争化”叙事的开始	(43)
五 谁有资格代表历史发言?	(47)
第二章 口头讲述和长篇写作	(50)
一 讲述大屠杀	(50)
二 长篇写作的开始和写作方式的独特性	(55)
三 报告文学抑或小说?	(62)
四 “一堆材料!”	(67)
第三章 中青社的约稿和“回忆录”的出版	(75)
一 流行出版物《红旗飘飘》“瞄向”罗广斌	(75)

2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

二 群众的反响和中青社的组稿	(80)
三 怎么讲述历史?	(86)
四 再次约稿和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	(90)
第四章 从“回忆录”到长篇小说	(94)
一 “大跃进”带来的机遇	(94)
二 党组织对小说写作的介入	(98)
三 再一次“试写”的失败	(103)
四 “满纸血腥”与“低沉压抑”	(106)
五 马识途在讨论会上的发言	(110)
六 沙汀的“慧眼”和贡献	(116)
七 “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小说的“翻身”	(121)
第五章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	(131)
一 出版社约稿的重要性	(131)
二 中青社的“重点稿”和“大盘菜”	(135)
三 作为“重点书”出版的《红岩》	(138)
四 责任编辑对《红岩》的修改和加工	(146)
五 中青社和当代文学的“当代化”	(155)
第六章 《红岩》的阅读和评论	(164)
一 评论家的作用和“《红岩》热”的生成	(165)
二 《红岩》的阅读方式	(174)
三 生产者们关于生产过程的措辞	(181)
第七章 作为政治罪证的文学写作	(190)
一 “文革”的开始和对文学作品的索隐式解读	(190)
二 “革命”和“不许革命”	(196)
三 “红”与“黑”的辩证法:革命文学的内在矛盾和自我颠覆	(200)
四 为《红岩》“翻案”和“翻案”活动的无效	(209)

附录一 《红岩》出版大事记	张 羽 (214)
附录二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部分)	罗广斌 (220)
附录三 大树不是从腰部往上长的 ——《红岩》著作权争执之我见	杨世元 (228)
附录四 还历史真面目	刘德彬 (232)
附录五 谈谈《红岩》	张 羽 (238)
附录六 我担任《红岩》责任编辑时特定的背景	张 羽 (246)
附录七 胡元访谈录	(253)
附录八 杨世元访谈录	(260)
附录九 林彦访谈录	(270)
附录十 江晓天访谈录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1)

导 论

一 被冷落的《红岩》和《红岩》研究

作为“当下文本”，《红岩》有过大红大紫的历史，也许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获得过超出《红岩》的荣耀，起码从发行数量和出版后的接受效应上看应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岩》和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一样被当做“大毒草”遭到批判。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红岩》的批判者主要还是伴随着革命“深入”而出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群众”，而官方媒体和官方解释者并没有对《红岩》有过明确的系统的“批判”性解读。在“文革”之后的1978年，《红岩》以及它的作者“恢复”了在“文革”之前的所有名誉，短时间内，人们对《红岩》进行了和“文革”之前几乎完全一致的解读和阅读活动。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回归”是非常短暂的。到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话语不再是人们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话语系统。《红岩》和其他的“革命文学”一样被读者迅速地冷落，而且，《红岩》受到冷落的情况也许尤为严重。

当然，80年代之后冷落《红岩》的不只是普通读者，学术界对《红岩》研究的冷落一样普遍。来自韩国的研究者朴贞姬对此说：“而第二次《红岩》热之后，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界几乎没有再评论过《红岩》。我翻阅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当代文学研究篇目目录，从1981年到1993年，只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岩〉的思想和艺术》，

2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

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的《枣庄师范学报》上。”^①作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研究者,朴贞姬没有中国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能够以知识学“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发现”被中国研究者“忽略”、实际上可能是有意冷落的《红岩》研究。而《红岩》研究在80年代之后冷清的情形不仅确如朴贞姬所说,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另一个同样在普遍的沉寂中“发现”了《红岩》的研究者李杨说:“尤为奇特的是,在80年代开始以‘重写文学史’为名的‘翻烧饼’的行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左翼文学作家和重要的文学作品都被纳入这种‘打破或者推翻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和结论’的‘重写实践’,却一直没有人提到影响更大、在审美形式和精神气质上与‘样板戏’更为接近的《红岩》。”^②而实际上,在90年代以来对当代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活动中,《红岩》也并不是研究者普遍注意的目标,李杨的考虑到“文本选择的系统性”的专门致力于“红色经典”再解读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的第五章中对《红岩》的再解读,也许是差不多仅有的对《红岩》的“再解读”实践。对此普遍的“冷漠”,朴贞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两次阅读热潮和两次批评冷漠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在这些热潮和冷点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力量呢?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又想起来重新评价它呢?”^③朴贞姬提出了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不过她却没有给我们提供针对该问题的答案。李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在80年代末的“重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能够“幸免于难”?而且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

① [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

②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③ [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

录更为准确。就如同《圣经》，在许多信徒看来，去考证圣经事迹的真实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们相信这些故事，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①为什么在几次重要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总是被学人忽略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这只能说明《红岩》是一个另类的存在，所以，即使是以“翻烧饼”为目的的“重评”活动也没有能与《红岩》产生联系的维度。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并非本文的目标，所以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虽然冷寂的情形大致如此，但是在 90 年代后期之后，还是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红岩》做出了有一定深度的探索。如 2002 年程光炜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文章《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叙事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对包括《红岩》在内的“红色讲述”系列进行了宏观的叙事策略研究。该研究把被人称为“三红”的《红旗谱》、《红日》和《红岩》视为新中国权力机构进行的宏大的政治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之下，程光炜从比较的角度论证了从《红旗谱》到《红岩》的“红色讲述”逐渐构成一个圆满的整体和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和策略。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论述有李杨对《红岩》的“再解读”和韩国研究者朴贞姬对《红岩》生产方式的研究。

二 李杨的“再解读”

李杨对《红岩》没能成为 80 年代末“重评文学史”的对象的解释是和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有关的：他所“关注的不是‘历史’如何控制和生产‘文本’的过程，而是‘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②这种批评方法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观是一致的。这样，他认为，像《红岩》这样的“红色经典”、“革命圣经”参与了国民认

① 李杨：《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78 页。

② 同上书，第 367 页。

知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建构与塑造过程,因此,当代读者和批评家的思想模式已经被这样的作品塑造成型,如果研究者不对“自我”进行“历史化”,不对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反思,就不可能对《红岩》叙事的合法性有所置疑。

李杨对“自我”进行“历史化”是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开始的,他认为:“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进主义,‘反思’革命。”^①这样也就确定了对《红岩》进行“再解读”的一种“解释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将《红岩》视为是一部现代性的教科书。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烈的现代性冲突的‘红色圣经’在展示出‘家庭’、‘个人’、‘身体’这些范畴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意义的同时,更表达了由‘施虐’与‘受虐’构成的现代性激情——一个世纪以来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在生活方式的极致的激情。这作为我们苦难的内核的荒诞而壮美的现代性激情,不仅塑造出属于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无意识,展示出现代性无与伦比的感召力。”^②

在李杨的“再解读”之前,在《红岩》的解读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解读活动。第一次是在《红岩》出版之后的最初两年,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最初两年。与李杨的“反抗式解读”相比,第一次对《红岩》的解读活动就是标准的“倾向性解读”^③。在这次解读活动中,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下百篇长短不一的各式文章。但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大众,他们在文章中都是极力地对作品中的主控性意义

①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S.霍尔关于电视文本解读的三种方式,分别是:“1. 主控—霸权式(dominant—hegemonic)解读:这种解读倾向于按照编码者的设定而‘彻底地’、‘直接地’接受文本。这就是倾向性解读。2. 协商式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这种解读承认主控符码的合法性,但通过调整使解读适应自己的特殊社会条件。3. 反抗式解读(The oppositional reading):它产生的是一种激进的解码,与倾向性解读完全对立,因为它源于一种替代性的对立意义系统。”见[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系统进行复制或复述,除了指出一些微小的瑕疵,几乎没有谁对作品提出异议。从这次阅读活动可以看出,《红岩》固然是在使用、加固甚至是生产一种官方倡导的情感方式和思想模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只是参与进行这种生产的力量之一,进行解读的专家和读者并不只是小说所生产的意义的信仰者,他们同时也是这种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实际上,作者和读者在写作和阅读小说《红岩》的时候,就都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情感方式和思想方式的空气中。第二次对《红岩》的解读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岩》陷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之争,成为革命团体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和《红岩》的作者进行政治角逐的另一派政治组织试图把《红岩》当做是打击对手的“软肋”之一,极力从《红岩》中挖掘不利于对手的政治罪证。他们的方法就是把《红岩》叙事结构中的某些负面形象或描述从整个结构当中抽取出来,进行夸张的展示,而这些形象或描述在作者的叙事结构中本来是被贬抑、被压制、被批判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文革”当中这些批判《红岩》的文章和李杨对《红岩》所做的解构工作颇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把被《红岩》的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加以掩饰、遮蔽和压制了的东西呈现出来。但是,两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目标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然也呈现出被作者掩饰和压制了的形象,但是他们和小说作者所认同的意义系统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把小说中的这些“破绽”揭露出来,不是为了给处在二元对立结构中被压制的一方确立某种价值,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形象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作为“反抗式解读”,李杨对《红岩》的“再解读”对小说的主导观念“荒诞而壮美的现代性激情”表示了根本的质疑,展示了“现代性特有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个人”与“家庭”的对立、“民族国家—阶级”与“家庭一个人”的对立、“精神”与“肉身”的对立,通过对小说文本修辞方法和叙事策略的详细剖析,揭露了作者是怎样赋予二元对立中的一方以更高的价值并使之自然化、合理化的。这样,通过李杨的“再解读”,那些在平滑的叙述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文化逻辑,被